

史語所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代序

杜正勝*

一、在世界學術中的史語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民國十七年（1928）籌備成立以來，至今整整七十年。相較於西方具有數百年傳統的大學或科學院，史語所的七十年算不得悠久，但在中國傳統中，近代意義的學術機構超過七十年的也不太多。尤其人文學方面，史語所有意標舉治學的新態度、新方向與新方法，目標明確，旗幟鮮明，罕有機構或團體能與之相比。

不論在中國學術界或世界東方學界，史語所的人力與成績固然有限，但就學術方法及其實踐而言，史語所多少還有指標意義，研究、檢討本所這七十年，對未來的人文學的發展，應當可以有一些啟發。

進一層說，學術發展無法遺世而獨立，必然會對時代社會的變化有所回應。七十年前和七十年後的史語所一定有所不同，這個團體的人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不同，面臨的時代問題不同，傳承的國內外學術傳統不同，更重要的，研究者本身的「人」不同。由於這些不同，使史語所的同人不嚴肅地認識過去，客觀地評估現在，以便有效地規畫未來。經過七十年的歲月，史語所已經延續了五個學術世代，有足夠的資料提供分析研究；也因為她是一個團隊，不像個別成言的一家，所以檢討過去以規測未來也才倍覺有必要。

* 中央研究院院士

具有頗負盛名之傳統的史語所，即將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史語所，旁觀世界學術思潮數度改易的史語所，現在絕大多數同人都經過世界學術思潮洗禮的史語所，還有處在臺灣——一個有多種可能走向的國家——的史語所，在這樣的基礎和條件下，往後的路該怎麼走呢？我的同人和我覺得應該利用七十周年所慶的機緣，由本所同人自我省察，並特約與本所學術領域相關，卓然有成的學者蒞所指導，召開研討會以聽取學界的高見。我們把研討的重點放在學術史和方法學的檢討，總其名曰：「邁向新學術之路」。史語所幾代人都走在新學術的道路上，未來研究所的內涵可能不同，但求新的態度和精神則不會改變。

我們雖然本著聽取諍言的態度來舉辦這次研討會，但從大會提供的報告引言文稿來看，受益的當不會只限於史語所的同入而已。

宏觀的歷史學者重視歷史分期，正確的分期能掌握某一特定時代的真相、通相和特質，連貫幾個時期或段落，便構成歷史發展的趨勢或軌跡，甚至可以嘗試找尋推進歷史發展的動力。可見分期是在把握歷史整體的認識，深入內涵，同時也發揮披荆斬棘的作用，不迷失於叢脞複雜的表相。本此態度，我們將史語所的歷史分做六期：

- (1) 籌備創立期（民國十七年一月至十八年六月），計一年半；
- (2) 塑形騰揚期（民國十八年七月至二十六年六月），共八年；
- (3) 動盪困頓期（民國二十六年七月至四十三年十二月）前後長達十七年半；
- (4) 生息復甦期（民國四十四年一月至六十九年十二月），約二十五年；
- (5) 開展多元期（民國七十年一月至八十六年七月），約十七年；
- (6) 新結構與新時代（民國八十六年八月至今），剛開始一年而已。

七十年的史語所有什麼創新，有什麼轉變，有什麼堅持？可能各有不同看法，但在這個以本所學術為主要討論對象的研討會正式展開之前，我願提供個人一點粗淺的認識，也許對以後三天的研討有一些參考價值。

二、半個世紀的傳統和實踐

無中生有

所謂史語所的傳統是在第一期和第二期這不及十年的時間奠定的。上章的分期有的涉及比較細微的考證，這裡不能備述，但有幾點仍須加以說明。第一，史語所是一個「無中生有」的機構，她的產生完全因人而成事；其次，創所建立的學風長期以來受到相當的尊重，遂塑造成史語所的面貌和性格，至少有五十年的時間，學術界一提起史語所就浮出某種固定的形象。

這裡簡述史語所最初五十年四期的歷史及其特點，先從第一期的籌備和創立說起。民國十六年底，中央研究院籌備之初，只準備設立四個研究機構，即理化實業研究所、地質調查所、社會科學研究所和觀象臺，¹ 既沒有歷史所，也沒有考古所，更無歷史語言研究所。後來和史語所有關的人物，這時分屬於各所的籌備委員，如專長考古學和人類學的李濟屬於地質調查所，專長列入歷史的胡適屬於社會科學研究所，而傅斯年則中央研究院準備聘他為心理學研究所的籌備委員；² 至於趙元任、陳寅恪，或顧頡剛，皆未之聞。

史語所是在十七年一月，傅斯年先生說服蔡元培而後成立的。同年十月他寫給陳寅恪的信說：「此研究所是無中生有」，³ 是記實之言。雖然史語所常務籌備員之正式聘請遲至三月底，其實籌備工作已在一月就開展了，到十月才有自己的所址，後來決定以遷入新居的日子做為所慶紀念日。然而如果從史語所的內涵來看，十七年十月成立的史語所還看不出未來面



圖一：年青時期的傅斯年

¹ 見〈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組織條例〉，《國立中央研究院總報告第一冊·民國十七年度》，頁4。

² 同注1，〈各研究機構籌備委員名錄〉，頁417-420。

³ 史語所檔案（簡稱「所檔」）元字9號之1。

貌的雛型。這牽涉兩層，一是人員結構，一是組織架構。關於人員結構，我在〈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一文中提出史語所初創，經歷從中山大學語言歷史所到清華大學國學院的轉變，成員背景與治學方法從「土派」轉為「洋派」，⁴ 此一轉變在十月尚未完成。

至於組織架構，史語所草創之初有九組、八組或七組等說法，九組說見於十七年五月傅斯年寫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屬於歷史者五組，即文籍考訂、史料徵集、考古、人類及民物，和比較藝術；屬於語言者四組，即漢語、西南語、中央亞細亞語和語言學。⁵ 八組說出自同年十一月傅斯年的史語所第一期報告書，即漢語、人類學、民物學、漢學、民間文藝、史料學、文籍考訂、敦煌材料和考古。⁶ 七組說則是十八年六月遷移北平後，第一次所務會議的發言記錄。⁷

不論七、八或九組，短短不到一年之內如此歧異，顯然是理想為配合現實所做的調整。譬如負責文籍考訂組的顧頡剛與傅斯年分道揚鑣，而傅斯年苦心羅致的陳垣原欲委以敦煌材料組，終不能來。及陳寅恪、趙元任和李濟接聘，十八年春天遷北平，人事底定，乃全盤檢討組織架構，而確定設立三組。第一組史學，文籍校訂等屬之；第二組語學，民間文藝等屬之；第三組考古學，人類學、民物學等屬之。⁸ 而陳、趙、李分別擔任第一、二、三組之主任，七十年來的史語所其基本規模至此確立。所以我們認為本所創立成形當斷自十八年六月。到二十三年原社會科學研究所民族學組併入，史語所乃有第四組，即人類學組；四十七年增設甲骨文研究室，發展成五組的架構，七十九年改名為文字學組。這些增益都可視為十八年三組原型的衍生，要到八十六年語言學組獨立成所，史語所才面臨基本的改變。

⁴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古今論衡》創刊號（1998.10）。

⁵ 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簡稱〈工作旨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1（1928）。

⁶ 傅斯年，〈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報告書第一期〉，「史語所檔案」元字198號之1。

⁷ 「史語所檔案」元字207號之3。

⁸ 同注7。

學風的建樹

史語所創所的基本理念和治學方法，首重收集整理新材料，三組架構確立，正式開展研究，一一實踐創所的理念，塑造史語所的治學風格。在歷史學方面，史語所投注大批人力物力整理新購置的內閣大庫檔案，成立明清內閣檔案編刊會，並且出版《明清史料》甲、乙、丙三編，共三十冊。重視材料，尊重材料，不尚議論，遂成為史語所的基本性格。

相對於明清檔案，史語所的中原考古則有立即引起學界注意的重大發現，改寫中國上古史，並且為古代史研究方法提供經典的示範。這時期的考古調查或發掘，北及昂昂溪、通遼、赤峰，南到南京，但主要集中在河南和山東，豫北的安陽、濬縣和汲縣，以及魯西的章邱與魯東的日照。⁹ 時代橫跨龍山時



圖三：河南安陽殷墟發掘



圖二：明清檔案

期、殷商、西周和東周。尤其安陽殷墟，論遺址內含之豐富，研究意義之創新，以及發掘報告的詳審都有劃時代和典範性的地位。

考古之外，語言和民族調查也展現史語所的治學態度。趙元任、羅常培屬於漢語，十八年加入的李方桂專攻非漢語。第二期漢語調查先後調查兩廣、海南、河北、陝西、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

⁹ 參石璋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年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2.9）。

的一些方言，非漢語則有黎、僮、獐、羅羅、苗，以及暹羅語和泰語。民族學方面，早在創所之始就調查雲南漢人、羅羅，川康羌民、西番；到人類學組成立，除先前的松花江赫哲族和湘西苗族外，馬上展開浙南畚民、雲南民族，以及滇緬邊境的少數民族，也對江南的兒童進行體質測量。¹⁰



圖四：雲南孟定

這時期史語所考古、語言和民族的業績正是傅先生所宣揚的理念——「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具體實踐，於是構成史語所學風的另一基本性格，不但找直接材料，而且是從田野獲得第一手的新材料。這些材料大多超越傳統材料的範圍，故此輩學者的典型和傳統讀書人截然不同。

史語所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也靠研究成果來建立。機關代表刊物《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至抗戰前夕出版到第七本第二分，與四期的《安陽發掘報告》和一冊的《田野考古報告》，共約刊出二百四十篇文章。史學的傅斯年、陳寅恪、丁山和徐中舒，考古的李濟和董作賓，語言的趙元任、李方桂和羅常培，他們的論文都具有典範作用。另外還有歷史、考古、語言、民俗和民族的專刊。這些林林總總的論著，問題新、角度新、方法新，更重要的是達到傅斯年所期望的高標準，躋于東方學研究之列，足可與歐洲的學術先進爭勝。就在這八年內，史語所奠定她的形象，確立她的標準，享譽國際；這八年也是史語所的黃金時代，故我們稱作「塑形鷹揚期」。

¹⁰ 參王懋勤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資料初稿》第五章，及王氏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大事年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四十周年紀念特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8.10）。

在困頓中成長

隨著抗戰的爆發，史語所開始一連串的遷徙，進入第三期。歷駐長沙、昆明、李莊、南京、楊梅諸地，最後到南港定居，前後十七年有餘，我們稱做動盪困頓期。

抗戰期間，因地制宜，各種調查發掘工作依然不曾間斷，但規模終不能與第二期相比。舉其著者，考古方面先後在陝西、甘肅、寧夏和四川、雲南等地進行調查和發掘，尤其中國大西北地區可補前一期專注於中原的闕漏。語言學和民族學多偏於雲南、貴州和四川等中國西南地區。遷來臺灣以後，駐紮楊梅時，考古、語言和人類學這三組的同仁也分別在北部和中部從事相關的調查和發掘，但研究條件並不比抗戰時期間稍有起色。¹¹

史語所進入第三期時，第一代人大都健在，依然領袖風騷，即使在極度艱困的環境下仍有破天荒的巨著，如董作賓的《殷曆譜》。但論此期之特色，最顯著的是第二代人登上了學術舞臺。第二代人大抵可以分成「先進」和「後進」兩批，抗戰以前進所者謂之「先進」，以北平幾所著名大學，如北大、清華、輔仁畢業生為主；抗戰期間進所者謂之「後進」，基本上是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和中央大學的學生。十年樹人，本所第二代人，尤其是先進，在第三期逐漸嶄露頭角，雖然他們的論著或遺留在淪陷區，或為後方條件所限，大部分等到抗戰勝利後才出版。史學如勞幹、陳槃、全漢昇、張政烺、李光濤、逯欽立、王崇武，語言如丁聲樹、周法高、董同龢，考古如高去尋、石璋如、夏鼐，文字如屈萬里，民族如芮逸夫、馬學良等皆逐漸成名。稍後，第二期「後進」之士也相繼展現他們的成績，如嚴耕望、黃彰健、王叔岷、張秉權，但基本上已東遷來臺了。¹²

民國四十三年史語所來南港定居，進入第四期，直到六十九年「五年計畫」實施之前，這漫長的二十五年雖比以前三期安定，但局面卻比以前縮小，算是生息復甦的階段。這時史語所逐漸引進年輕學者，屬於第三代人。他們大多是臺灣大學畢業，也受教於史語所第一代和第二代的著名學者，大抵還習守

¹¹ 同注10。

¹² 上述名單根據史語所出版刊物粗略估算，只舉其大概而已。

史語所治學的態度。其中有些人出國深造，甚至帶來新的治學方法，譬如許倬雲，在臺灣學術教育界造成極大的影響，但由於多種外在因素，對史語所本身並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

史語所第四期人力結構呈現嚴重的外流現象。第一代的趙元任和李方桂，分別於抗戰初期和抗戰結束赴美，民國四十年代董作賓也有一段時間離臺赴港。民國五十年代，第二代的勞榦、周法高、李孝定和嚴耕望，以及第三代的許倬雲、陶晉生亦先後赴東南亞和美國任教。雖然他們離所的原因不同，有的人到晚年也再度返所復職，唯就史語所的學術傳承而言，則因失血而幾乎斷層。

即使如此，史語所第四期的成績，《集刊》持續不斷出版，個人專著相繼問世，在歷史、語言、考古、民族和古文字各領域都可列為經典的著作。本所主持下的不朽著作，考古有李濟的古器物學專刊，石璋如的小屯墓葬與建築遺存，高去尋的侯家莊大墓；甲骨文如張秉權的《殷墟文字丙編》的綴合和考釋，以及李孝定的《甲骨文字集釋》；歷史如李光濤的《明清史料》、勞榦的《居延漢簡考釋》、黃彰健的《明實錄》校勘；語言如李方桂的《武鳴土語》、張琨的《西藏口語語料》、董同龢的《鄒語研究》；民族如芮逸夫和管東貴的鴉雀苗禮俗等。然而這些業績多是收割前時期各種調查和發掘的果實，表現史語所重視新材料的一貫學風；我們可以說，史語所創立的理念經過第二、三期的實踐，到第四期才有機會比較全面地把實踐所得的成果公諸於世，雖然方言調查報告之出版還要晚幾年。

史語所自籌備創立以來至第四期結束時，已超過半個世紀，因客觀環境轉變，研究條件也有所改善，遂進入屬於她的現代史的第五期。

三、體質多元化的開展

民國六十九年，不論對整個中央研究院或對史語所的發展，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本所歷史進入第五期，這轉變最直接的觸媒是這年七月開始推動的「五年計畫」，政府投資大筆預算支持學術研究。有經費，也有名額，人才設備逐漸充實，全院氣象為之一新。

第五期的轉變其實有更深刻的意義，臺灣的經濟已奇蹟似地起飛，社會上中產階級已經成型，戒嚴體制如強弩之末，政治民主化和思想自由化成為普遍潮流。這些學院外的變化給學院帶來衝擊，也給學院注入活力。

我在民國六十九年九月進所。我常常有個感覺，好像站在一條山脈的分水嶺上，一邊看到的是史語所過去的制度，另一邊看到的則是史語所逐漸浮現的新面貌。我初來時，體驗到過去拮据儉樸的作風，威權猶存的氣氛，和輩分井然的秩序，當然也感受到「所即是家」的融入與認同。與我同輩而先我幾年入所的同人應該能憶起當時的場景，想必也會與我有相同的感受。如果我的感受比較強烈，可能因為我初來就緊接著巨大變化的緣故吧！

經過長期的人事凍結，民國六十九年夏天以後若春冰解泮，直到現在，史語所年年進用新人。尤其七十一至七十六這六年間，連續進用三十六人，¹³ 超過民國六十三年時全所研究人員的總數將近一倍半；往往一年內進用五、六人，最多且有八人。我之所以舉六十三年做斷限，因為在此之前舉用新人遲緩，人數極其有限，六十四年以後才逐漸再吸收新進，但六十四至六十八這五年內全部只進用六人而已，可見七十一年以後發展的快速。

如果從民國六十九年七月新會計年度，也就是「五年計畫」正式執行之時算起，到八十六年六月語言組獨立成語言所籌備處之前，單單這十七年中新進的人員便有五十六人之多，占六十三年全所研究人員總數的二倍，也是六十八年時全所的1.75倍。加上第五期中，老輩或退休，或凋零，史語所的組成遂轉而以新人為主。結構成分之「新」，即是史語所第五期的一項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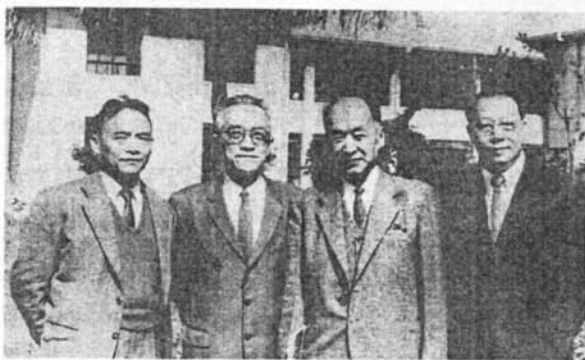
新人促使研究所的體質產生轉變，一是年輕化。上述直到語言組獨立前所進的五十六人，只有一人年齡超過半百。也就是說，史語所在這十幾年的新進的五十五人，基本上多是大學研究所剛畢業的碩士或博士。第二是心態的變

¹³ 七十一年六人，即那義田、洪金富、鄭秋豫、陳鴻森、王道還、余澤宇；七十二年五人，即黃進興、鍾柏生、劉淑芬、康樂、劉益昌；七十三年六人，即蒲慕州、蕭珊、石守謙、劉錚雲、王明珂、陳韻珊；七十四年七人，即于志嘉、林素清、王汎森、高有德、魏培泉、邱敏勇、陳光祖；七十五年四人，即顏娟英、何漢威、林英津、孫天心；七十六年八人，即莊申慶、廖伯源、柳立言、黃居仁、劉增貴、陳玉美、蔡哲茂、林富士。參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10）。

化，第四期最後四五年進所的新人，絕大多數皆碩士級的助理研究員，受制於內外的威權體制，當時很少有獨立的發言權，但第五期的新秀相當高的比率是以副研究員的身分應聘的。副研代表具有獨立研究的能力，進所不久對所務言論就發揮一定的分量；再隨著臺灣政治的民主化和社會的自由化，史語所的家長式權威結構乃逐漸解體。

第三種改變是多元化，對史語所的學術傳統衝擊最大。史語所第一代人是同志的結合，治學態度相同，奮鬥目標相同，家國的感情也相同。¹⁴ 第二代人雖然不是清一色的北大，但基本上多是第一代人及其朋友的學生，入所以後配有導師予以指導，史語所遂有所謂的導師制或學徒制。到臺灣來以後，由於史語所與臺大文學院建立合聘制度，第三代人大抵是在這種制度中養成，進所以後仍然有導師指導。史語所向來濃厚的師徒傳統到第四代人，也就是四期末五期初進所的同人便淡化了。淡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則史語所的學者頗多「散而之四方」，留守者也不以教學見長，自然不易傳承；再則是史語所內部導師制已經廢弛。不過最重要的因素恐怕是這些新進人員，即使在臺灣求學時有機會直接或間接受教於史語所的學者，他們多在外國修習了最高的學位，也就是說，他們的治學方法或態度得自外國者可能比本國深。那麼從外國（主要是美國）各名校畢業而進入史語所研究的同人自然會給本所帶來各色各樣的學術傳統，於是相當徹底地改造本所的體質，使趨於多元化。

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史語所所長李濟在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會議酒會上慨嘆科學未能生根，青年留洋不歸，與會院士雖有強作樂觀的，¹⁵ 但仍難免流露「新



圖五：梁序穆、胡適、李濟與李先聞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合影

¹⁴ 參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

¹⁵ 參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冊十，頁3899-3901。

亭對泣」的意味。此一景象可以做為史語所第四期歷史的寫照。然而三十年後，局面完全改觀，不但英才匯聚，由於研究經費相對地充足，學術活動也呈現數十年來得未曾有的活躍。概括歸納起來有五多，一是專題計畫多，二是委託計畫多，三是大小型學術研討會多，四是客座訪問和學術講座多，五是學術合作協議多。其詳不能備錄，本所最近出版的《七十年大事記》可供查考。

這些學術活動還透露幾項特點，第一，沒有放棄史料收集和整理的傳統，以漢籍文獻自動化和明清檔案重新全面整理的規模最大，投注經費最多；另外規模較小者則有唐代墓誌銘與漢簡。其次是田野新資料的充實。考古，在臺灣各地從事發掘和調查；語言，除本土的南島語調查研究外，亦旁及藏緬語；民族學調查長年來停頓，但近年也開始在羌族地區進行。第三，研究計畫有明顯的專題化趨向，不純以資料之收集為主。

民國八十五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通過成立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次年六月語言學組獨立。評議會亦決定史語所名稱不變，剩下歷史、考古、人類學和文字學四個學術組。此一新結構是這個七十年的老學術社群未來發展的基礎。

四、承襲傳統所面臨的挑戰

世界學術界內部的變化，長年以來推陳出新，於今為甚。史語所創所的目的是要與外國的東方學者對話，自然不會自外於世界學術界。幾十年來隨著臺灣的開放發展，史語所很自然地融入世界學術社群，可能汲取的養分，或感受的知識壓力已超出東方學的範疇。她所標榜的治學態度，重視的治學方法及數十年來多學科互補的組織結構，也到達非徹底反省思考不可的時候了。

史語所人員要面對這種新局面的當然不是第一、二代人，甚至也不是第三代人，而是第四代及第五代的人。在討論如何面對這番變化之前，請先了解史語所現在的結構。史語所現有研究人員共62名，其中屬於第二代者2名，第三代者4名，其餘都是第四和第五代，占九成以上。第四代人除少數稍早三、四年進所外，多在六十九年（即史語所第四期）以後才加入這個學術團隊，而今則構成研究的主力。他們自入所以後，經過十幾年的潛修精研，紛紛臻於成熟，在許多領域佔有領袖性的地位。未來史語所開展新局主要就是依賴這批

人。史語所過去被視為「老人所」，其實現在全所平均年齡只44.3歲，而占九成以上的第四、五兩代人則更年輕，平均40.7歲。論年齡級距，分布在36至50歲者最多，占有六成以上。從年齡結構看，史語所目前的研究活力是非常高昂的。

還有一層，史語所現在成員在外國完成最高學位者占全所53%，占第四、五代人的60%，若把曾經到國外長期研究者也包括進去，則分別提高到74%和84%。這些數據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組各研究所研究人員外國最高學歷的56%相比，已相當接近。¹⁶ 由此又可澄清一個印象：這個向來以研究中國傳統歷史文化的史語所，不是古董，即使包含只有中國人才容易掌握的學門（如文字學），其成員之養成教育仍然非常國際化。這些背景都是我們思考史語所未來發展的重要基礎。

雖然現在史語所的結構已有這麼高度的「新」成分，人員來源多元化，也沒有硬性的規範或戒律，但誠如上文所論，即使在六十九年（1980）以後，仍然可以感受到史語所的傳統，所以討論未來，還是要從最根本的創所理念說起。

堅持直接史料

史語所治學素重史料是大家都知道的，並且成為一個「註冊商標」，以致掩蓋創所的其他宗旨。史語所強調的材料，是新而直接的材料，傅斯年〈工作旨趣〉說：一種學問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間接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只研究前人所創造之系統的則退步。又說：凡一種學問能擴張材料的便進步，否則便退步。他這麼宣揚史料的重要，也一再說近代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史語所長年以來堅持此一信念，身體力行，遂獲得「史料學派」的稱號。

外界所謂「史料學派」往往帶有貶義，指史語所的人只知搜集、整理和排比史料的工夫，不會解釋歷史，更無理論。此種偏見已有人指出是望文生義或

¹⁶ 據民國八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央研究院人事室提供的資料，本院人文組各研究所研究人員394人，最高學歷國別，中華民國175人，美國168人，日本16人，英國14人，德國10人，法國5人，其他6人。外國共219人。

斷章取義造成的誤解與曲解。¹⁷ 其實這個「史料學派」是不是只懂得史料排比，沒有歷史解釋，應該就她已出版的六十九本《集刊》、八期考古期刊、三期人類學刊、五種會議論文集（國際漢學會議不計），共將近一千八百篇論文，以及九十九種專刊、三十五種單刊和三十六巨冊田野工作報告加以分析，不能只對一兩句革命式的宣言馳騁議論。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史學不會只等於史料，但缺乏可信而有效之史料作基礎的史學勢必淪為空論，則是很多聰明之士往往忽略的。誠實的學者絕對堅持空論不是學問，難以驗證的「史觀」大理論只適合做為信仰；這兩種議論都有痛快淋漓的特性，很能引誘人，但對人類知識卻難有增益。何況人之才性不同，即使只有整理資料，踏踏實實把材料整理出來發展，雖然樸拙，至少對學術界還有一點貢獻，不像馳騁於過眼雲煙之理論家，往往鬧笑話，而且貽誤他人。¹⁸

史學不等於史料，但史學等不等於史料學呢？這問題要看你對「學」字作什麼樣的詮釋。傅先生《史學方法導論》〈史料論略〉的序言說：「史料學便是比較方法之應用。」可見史料之成為「學」要看「比較方法」用得是否妥當，是否深入，他說：

史料是不同的，有來源的不同，有先後的不同，有價值的不同，有一切花樣的不同。¹⁹

這已清楚地表明他不會單純到「照單全收」地相信史料，也不會機械到只把史料排比出來讓它們講話即可。譬如他的未刊稿〈天問〉討論神話的史料性質就說：

所謂神話故事之有史料價值者，不是說神話故事是信史，乃是說神話故事是若干早年民族之世界觀、歷史觀，可由其中找出社會的背景，宗教

¹⁷ 許冠三，《新史學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6），頁215-2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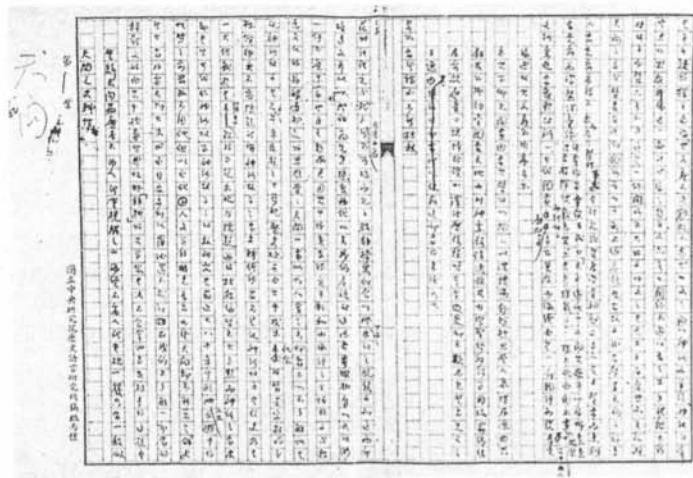
¹⁸ 李光濤引述傅斯年的話說：「歷史語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應搜集材料。而第一步之原料為最要，將來有所發表，即無大發明亦不致鬧笑話。因此種原料他人所未見，我能整理發表，即是對於學術界之貢獻，決不致貽誤他人。」見李著〈明清檔案〉，《傅所長紀念特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51.3）。

¹⁹ 《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9）冊二，頁6。

的分素，文化的接觸，初民的思想等等。²⁰

能從神話故事看出社會情境、宗教文化以及初民思想的種種歷史現象，是要靠比較方法的應用才可能達成；應用能不能充分發揮，則繫於他所提倡的多學科之互補是否真的實踐。這麼說，我們至少理解所謂比較方法的史料學實已超越史料的層面，而屬於科際整合的境界了。整合得好，應用充分發揮，如果能做到他在《中國古代文學史講義》所揭示的目標：「史料賦給者以內一點不少說」，大概也就可以「史料賦給者以外，一點不多說」了。²¹ 把史料之「有」說得徹底，大概也就不必去說史料之「無」的部分了。這是利多而弊少的好方法，但不少人卻硬是喜歡去講史料之所「無」。這也牽涉到他在〈工作旨趣〉另外一個爭議性的話題：反對疏通。其實他「只求證，不言疏」的治學方法，本義是要清除中國傳統史論的流毒，是要把史學研究導向學術之正軌，故說：「不受任何傳說（統？）觀念的拘束」，²² 想不到卻遭受號稱進步之史學家的譏諷！

傅先生和史語所這麼重視史料，存在著一個基本的前提，即相信有客觀真實的歷史，而且可以人力追求得到。史學能不能絕對客觀，傅先生雖然多少有些存疑，但他絕對相信「史料中可得之客觀知識多矣。」²³ 這當然不意味史料自自然然就客觀的，不過關於史料可能存在的主觀性，傅先生著墨



圖六：傅斯年〈天問〉手稿

²⁰ 「傅斯年檔案」II：630。

²¹ 《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9）冊一，頁69。

²² 同上，「傳說」，疑是「傳統」之誤筆或誤植。

²³ 《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3）冊四，頁356。

不多，而且他也比較少提醒史家在排比或比較史料的過程所可能摻雜的主觀因素，遂難免對史料客觀知識之獲得過度樂觀，²⁴ 這對比較方法史料學的周密度是會有所折損的。

本來史料的產生就可能帶有作者的主觀性，史料的排比解釋也會挾雜學者的主觀偏好；即使如此，天地間是否就沒有「客觀」的「真實」歷史，而一切記載只存在於人的理解或與主觀性的對話嗎？好學深思之士固不妨鑽研連綿無盡的玄思，但對活生生的人，譬如被控謀殺罪的死刑犯，有沒有謀殺，怎樣謀殺，宣判什麼罪名，以及怎樣執刑，應該都是客觀而且是真實的存在。歷史家對於歷史事實的了解和認定，寧近於法官之審讞，而遠於哲人之玄想。史料以文字語言為媒介固先天地潛藏著一些陷阱，言不能盡意，文可能掩義；即使如此，我們就有理由相信「真實是想像的產物」(the real is as imaged as the imaginary) 嗎？一九九〇年代初老牌史家 Lawrence Stone 和年輕學者的爭議，²⁵ 追根究柢，恐怕是對「實體」與「媒介」之差距的認知寬窄不同吧。

倡議史料的傅斯年先生不是不知道史料之中大有陷阱在，以他對自然科學涵養之深，尚且知道自然科學的所謂「客觀」，其實有不少是科學家的 anthropomorphism（按自己的形象來描繪所說的對象），而社會科學在發達過程中，也有很多社會文化的偏見；不過，他也堅持超階級的見解和超階級的事實卻也不少，不能一筆抹殺。歷史社會的客觀性，推到極端，不論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傅先生承認都是個「理想的境界」，然而我們「想以客觀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觀，一旦完全把客觀放棄，認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以為一切社會的方法都是從某一主觀的法規，這對於社會科學之進步當然是一個大障礙。」²⁶ 這是他晚年給臺大法學院《社會科學論叢》所作發刊詞的叮嚀，表達了他對社會科學方法論的見解，想不到四十年後還用得上，相當切合後現代主義對史學衝擊所衍生的議題。我認為歷史終究應該有個真實——這樣算是信念嗎？——史家即使不能至，心不能不嚮往之。追求知識的

²⁴ 參杜正勝，〈史學的兩種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當代》133(1998.9.1)。

²⁵ 參 Lawrence Stone,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Past and Present* 131(May 1991); 回應見同刊133期 Patrick Joyce 和 Catriona Kelly 之文，135期 Stone 及 Gabrielle Spiegel 又有所回應與討論。

²⁶ 《傅斯年全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3）冊四，頁364。

人總要想盡辦法獲得那個真實，他應感謝後現代主義者提醒所有可能的陷阱，但不能停下來或走回頭路，應該一步步朝向前去。

反省科際整合

史語所是一個多學科組合的研究團體，從所名來看，包括歷史和語言兩大範圍。傅先生之引語言學入歷史研究，根據文獻可以追溯到民國十五年回國前夕他從柏林給胡適寫的那封長信，他說：「弄古代的方術論者，用具及設施大多是言語學及章句批評學」，治佛學或宋明理學，用具「全不是言語學的事了」。因為他準備回國後，「將隨（顧）頔剛而但論古代的，不下於南朝。這些東西百分之九十是言語學及文句批評，故但教追亭林（言語學）、百詩（章句批評）之遺訓，加上些近代科學所付我們的工具而已。」²⁷ 兩年後他創辦史語所，語言與歷史含蓋的分支就相當多，〈工作旨趣〉和給米勒（F. W. K. Müller）的信函都有詳細的規畫。²⁸

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這兩大範疇基本上各自為政，給米勒的信甚至說語言之部設在廣州，歷史之部設在北京。誠如給胡適的信說的，語言學和章句批評只適合用於漢代以前的方術研究，但史語所的研究範圍卻不限於古代，何以獨獨取「語言」為名呢？從初創時期的文獻來看，語言與歷史之分離似乎是必然

²⁷ 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冊三七，頁357。

²⁸ 〈工作旨趣〉云：一、文籍考訂，二、史料徵集，三、考古，四、人類及民物，五、比較藝術：以上歷史範圍；六、漢語，七、西南語，八、中央亞細亞語，九、語言學：以上語言範圍。與米勒信（「史語所檔案」元字55號）雖寫在十七年五月，與〈工作旨趣〉同時，但規畫略有不同，分為(I) Philologie（語言）：A. Textkritik der alten Literatur（古代文籍考訂），B. Dialektforschung und Phonologie（方言研究與音韻學），C. Erforschung der indo-chinesischen Sprachen（印度支那語言研究），D. Zentralasiatische Sprachen（中亞語言），E. Indische Sprachen（besonders Sanskrit）（印度語言，尤其是梵文）。(II) Geschichte（歷史）：A. Praehistorie, Archaeologie und Palaeographie（史前史、考古、古文字學），B. Forschung der Geschichte von der aeltesten bis zur neuesten Zeit, insbesondere zunachst materialsammlung und Guellenforschung（從古代到現代的歷史研究，尤其是史料的收集和研究所），C. Kulturgeschichte und Volkskunde（文化史和民俗）D. Kunstgeschichte（藝術史）。

的結局。不過，對於這個問題我沒有足夠的學養可以討論，只就常識層面說，像民國二十二年以前陳寅恪的語言學與史學之互證，或如外國東方學家論東西民族文化交流的經典著作，語言學仍然是歷史學的好幫手。而漢語方言與非漢語的調查，對族群文化的研究也應該有所助益。



圖七：陳寅恪

從史語所成立的過程來看，結合不同學科雖有其理論意義，但也明顯存在著因人設事的情形。不論八組、三組、四組或五組，都脫離不了人的因素，也就是說，所謂集眾研究的諸學科，其結合基礎不一定是不可割捨或不可取代的。只有不同學科間存在有共同課題，而且覺得需要對方的協助，這個學術團隊才可能存活下去。如果中心課題喪失，各學科勢必分道揚鑣，而這個團隊便面臨解體的命運。七十年的史語所證明，所謂學科整合，歷史與考古是最成功的，因為史語所有像李濟那樣關懷歷史命題的考古家，考古家遂成為史學家不可或缺的同志；²⁹ 但如果考古學家寧願為人類學家，或考古家有比歷史文化更迫切的追求，到那一天，再一次的結構重整恐怕也是無可避免的事。

其實一個多學科的團隊，只有課題之主從，學科之間是沒有父子的。像史語所這樣的組合，只有把人類的歷史文化當做中心課題，匯集各種學科的特殊方法以解答之，才可能各盡所長而合作愉悅。以法國年鑑學派成功的經驗來看，據 Jacques Revel 的考察，布洛克 (Marc Bloch) 和費夫爾 (Lucien Febvre) 成功之處在於能在史學的周圍組織了一個人文社會科學系統，而這個系統所圍繞的中心學科則是史學。³⁰ 按照我的理解，這樣的「史學」意涵是很廣的，即以人類社會的歷史文化為總目標的學科，它可以是人文學或人文社會科學的總稱，而不是現行大學體制中，文學院之歷史系的歷史而已。

西方體制的學科分類經過這一百年的發展，似乎有一趨勢，即一個學科的

²⁹ 參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文物季刊》（山西）28(1998.3)。

³⁰ 見梁其姿等編譯，《年鑑史學論文集》（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9.10），頁4。

邊緣部分逐漸與別一學科的邊緣接近，反而與本門的核心疏遠。原來屬於同一學門的舊學科，因核心與邊緣愈離愈遠，於是分解；而不同學門的邊緣地帶，因為互相鄰近遂可能組成另一新學科。在新學科形成以前，最普遍的要求是科際整合。就臺灣學術界過去三十年的經驗而言，科際整合並未確實實現過，因為每一學科都固守本位，而且缺乏中心課題。史語所早在七十年前不但走上科際整合這條路，形成中心課題，其成員並且在治學態度、方法甚至人生觀，都有相當一致的地方，她應該是今日思考學術政策，提倡科際整合的人借鑑的典範。但中央研究院以及全國學術界並沒有從她這七十年的歷史汲取什麼經驗。

話回到史語所本身，現在史語所的建置有四個學術組，主要包含三個學門，未來可能分，但也可能合，端看史語所的同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如何發掘相通的課題，以及如何認識學術的走向而定。

五、走入社會的新學術

史語所作為一個多學科的研究團體，她標榜的另一宗旨是擴張新工具。類似於對史料的堅持，傅斯年先生也說過：凡一種學問能擴充研究應用的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退步。所謂工具，包含各種不同學科所採用的方法。當時世界的學術風氣，社會科學剛剛興起不久，傅先生對自然科學又有相當的修養，所以他舉涉的新工具多屬於自然科學。但隨著治學態度與方法的轉移，世界主流思潮是社會科學逐漸進入史學，一度且有入主出奴之勢。歐美風氣如此，臺灣亦不例外。

然而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種風氣基本上並沒有波及到史語所，其利弊得失當然難以一言而蔽之。不過現在整個所的人員結構既已徹底改變，成員大多熟悉世界主流的走向，累積研究成果，雖欲捍隔世界潮流亦絕無可能。當然，在另一方面，史學界也比較成熟，不再那麼景仰社會科學方法；即使對從本質上質疑研究憑藉（即史料）的新思潮，史語所也能有所堅持，有所取捨。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更冷靜思考自己的長短，採擇各種可用的資源，創造最宜合自己條件的研究。

以過去幾年史語所工作的經驗，繼傅斯年先生擴充新材料、擴充新工具之

外，我們可以以擴充新領域做為未來發展的方向。³¹ 近年我們既尊重個人研究，也規畫集眾的工作；我們先建立一個個的研究基地，再由基地去推動專題研究。這些研究基地即是本所的專題研究室，包含國家與社會、思想文化史、法制史、禮俗宗教、生命醫療史、臺灣考古、東南亞考古、生態考古、古文字、文物圖像及出土文獻等領域。我們想以研究室規畫、推動研究計畫，以及學術活動，假以時日，逐漸有成，則新領域自然會一個個被開發出來，學術傳統自然就形成了。向來臺灣一直有人鼓勵科際整合，國家資源也一直投注在一個個研究計畫上，我們的專題研究室可以含攝這些長處，但因為有基地，必定更有久遠性。短短幾年來，這些專題研究室有的已開啓一些領域，略有所成，並且得到國內外同行的肯定。

不過，無可諱言的，史語所有些傳統對成員無形中也塑成一些習性，對未來的發展可能會造成障礙。回顧這個學術團隊產生的歷史，她和所賴以生存的土地、社會，以至時代的關係並不大。傅先生有感於中國學術不如人，乃師法歐洲東方學家的治學態度與方法，援引前賢一些值得提倡的遺訓，利用材料上的方便，而發起豪情壯志，創辦史語所，目的是想把正統的東方學從巴黎轉到中國來。這當中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心理因素，即「為中國而豪外國」，因此，他主要對話的對象是歐洲第一流的東方學家；因此，他的團隊「只要有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即可。既不以人多取勝（人多不一定能取勝），也不想影響或改造社會群眾，甚至不願他的成員受到外界「烏煙瘴氣」的感染，³² 於是這個團隊便逐漸養成象牙塔的性格。

且不說利弊得失，這樣的性格要在一個研究機構長期存在，首先需要有一把極強、極大的保護傘；而且其成員也只願與古人遊，與萬里外的同行為友，不在乎周遭的環境。但現在史語所面臨的環境與以前卻有根本的差別。從全世界的局面看，持續四、五十年的東西兩大陣營的對立，到九〇年代初隨著東歐的轉變和蘇聯的解體而結束，過去神聖化的意識型態勢必煙消雲散。人類雖然

³¹ 參杜正勝，〈什麼是新社會史〉，《新史學》3.4(1992)：95-116。

³² 參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古今論衡》創刊號(1998.10)。

拋棄舊包袱，而在這個世紀末和新世紀將要來臨時，也必定會發現新的危機和急切要解決的新問題，譬如環境維護與經濟開發的平衡，國家主權與個人人權的衝突，對資源與文化的重新認定，以及人在地球上的地位的反省等等。這些思潮必定會衝擊學術界，學術研究對於人類面臨的新問題也不能不有所回應。

我們再把問題範圍縮小一點，回到臺灣本身，回到這個創於廣州，發於北平和南京，而在臺灣度過半個世紀的史語所。史語所原來在全中國最高學術機構的中央研究院中，是人文學研究力量最雄厚、成果最豐碩、名譽最尊崇的一個研究所，在世界學術界也曾被視為中國學界的代表。³³ 她甚至有段時間是中央研究院唯一的一個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研究所，自民國二十三年（1934）社會科學研究所與北平調查所合作後，到四十四年（1955）民族學和近代史兩個研究所籌備處成立之前，史語所一所便代表了中央研究院全部的人文社會科學。如果說史語所原屬於「中央的中央」的地位，恐怕也不誇張吧！遷來臺灣，客觀情勢改變，臺灣不能代表中國，史語所即使有些優異成績，並不足以做為檢視中國人文學研究的指標。這情況在八〇年代以後逐漸公開化，到九〇年代臺灣社會急遽轉變，臺灣主體意識快速確立，一向以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為主的史語所乃逐漸被社會邊緣化。人文社會科學長期以來就不是國家學術的主流，過去二十年，人文學又比社會科學更遠離現實社會，更無發言權，史語所面臨的新局面隱然帶有「邊緣的邊緣」的危機。

對追求科學真知的人，蟄居象牙塔並非壞事，然而歷史這門學問，當研究者與世隔絕時，他還能得到什麼思想上的啟發，透視什麼歷史現象，觀察到什麼歷史癥結嗎？換句話說，象牙塔性格適不適合做歷史研究，這個嚴肅問題在三十年前的今天，史語所四十周年慶時，臺大文學院院長沈剛伯先生蒞所演講「史學與世變」就碰觸到了。沈先生很含蓄地指出史語所的新史學是與社會脫節的純史學，固有其可貴之處，但與時代社會隔離的純之又純的史學如何維持不斷的創新力以免於枯竭，如何接受外界不斷的刺激以產生新觀念，寫作新史

³³ 見《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年大事記》，民國二十六年條。一九三七年二月英國劍橋大學 Harold Temperley 函邀中國參加國際歷史學會，教育部同意本所建議：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義致函國際歷史學會申請參加，中央研究院評議會歷史組推薦人選，由教育部委派，年費及出席代表旅費由教育部補助。

書，如何從時代社會的轉變中尋找靈感以開展研究的新路徑或新境界，³⁴ 是史語所同人不能不認真思考的問題。

走出象牙塔，走入社會，不是拋棄學術，反而是要發展學術——至少是環繞史學為中心的人文社會科學系統。一個走過七十年歲月的機構，考古、語言和歷史部門曾在新資料的發掘收集上，完成可觀的貢獻，民族部門也擺脫傳統以漢人



圖八：史語所的諍友沈剛伯

為中心的習性，以「他群」的研究為志業。然而基本上，史語所的學術還是以中國為主要的研究對象，此一先天的限制對未來的發展恐怕不見得有利。然而中央研究院的人文學還是限於中國，院方政策性地發展漢學，並且相信這是臺灣人文社會科學進入世界學術主流的憑藉，只要能用主流通行的文字發表就成了。

這使我想起傅先生〈工作旨趣〉反對「國故」這概念的宣言，他說：

學問斷不以國別成邏輯的分別，不過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

因此他反對西洋人所造、與埃及脫邏輯 (Egyptology)、亞西里亞邏輯 (Assyriology) 等同的「新諾邏輯」(Sinology) 之名，雖然難免有些「民族的」憤慨，但他的認識我基本是贊同的。歷史雖然有時代、國家和民族的分別，那是材料，但歷史「學」作為一種學科就不能只以特殊材料見長，而應該具有普世性，不論是從學術研究或文化關懷來說皆當如此，這恐怕是傅先生反對「國故」這個概念的原因。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老在中國的圈子內打轉，所以他宣示要：

擴充材料，擴充工具，勢必至於弄到不國了，不故了，或且不國不故了。

³⁴ 沈剛伯，〈史學與世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40上(1968)；杜正勝，前引〈史學的兩個觀點——沈剛伯與傅斯年〉。

從這條路把中國的學術帶入世界主流，至於使用不使用主流文字已是次要了，雖然那是一種有利有效的工具。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要超越中國的政治疆界，走入亞洲內陸，航向南洋，這兩個方向，七十年前他就提出來了，可惜沒有發展下去。他原想在這方面栽培幾個年輕學者，也因種種主客觀因素無法收到預期的成果。

*

*

*

史語所的目標是要在世界學術中佔一席之地，我做為她的一個成員，思索這個問題，但苦於難得良策。妙計應該在各位學者的口袋中。然而歷史家總相信歷史發展是層層相因的，我們肯定研究新領域的重要意義，要開發新領域，擴大新領域；但我們也不能不更加批判地自我檢討——我們能不能跳出漢人的界限看歷史文化？能不能跨越中國的疆域全面地看人類的活動業績？能不能走入社會，從時代問題激發學術課題？我們企盼看到一個更遼闊的原野，一個更晴朗的藍天！